

经济治理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

庞晓波,刘延昌,黄卫挺

(吉林大学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政府指令治理与市场信号治理是最基本的经济治理机制,传统观点认为两者是非此即彼的垂直替代关系。基于中国和东亚的经济发展及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等现实考量,本文提出两者是平行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应该继续秉承这种治理机制的水平互补观,在动态上优化两者的水平组合边界,提高治理的组合效率。

关键词:经济治理;中国经济发展;政府指令;市场信号;垂直互补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0)05-0034-03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治理研究者意味着国外经济学界在思想上的重大转向,即从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崇拜转向理性的反思,并在这场内省过程中重新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果说2007年将诺贝尔奖授予具有法国学派传统的机制设计理论是经济学界遮遮掩掩的琵琶遮面,那么2009年诺贝尔奖花落经济治理领域,则意味着国外经济学界已经正式对外宣告其内省的结果——市场经济体系不应该是没有政府的运行体系。笔者认为,该结论的提出并不是空想的结果,相反,它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

一、经济治理思想转向的现实背景

西方经济学界的思想转向至少存在两个重要的现实背景:其一是中国与东亚经济发展成就及其带来的众多经济学未解之谜,其二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给西方经济学界带来的学术信誉危机。中国与东亚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是这种反思的外部推动力,因此,这也预示着东方世界在经济学理论构建上完全具有自己的话语权和本土性;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则加速了这种反思的进程,并最终选择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平台将反思结果公示于众。

首先,对于中国与东亚经济发展历程,西方经济学家往往冠之以“奇迹”,其背后不仅体现了中国与东亚经济的成功,也折射出了西方经济学界在这种奇迹面前的尴尬境地,因为他们无法用那些引以为豪的理论和模型对东方世界所发生的经济现象做出解释。从亚洲四小龙的集体亮相,再到中国、印度的迅速崛起,除了应用比较优势、进出口理论等古典经济学遗产进行解释之外,西方经济学在理论层面和思想突破上基本是停滞不前,这与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西方经济学界更是鲜有作为,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对于经济体制转轨,西方经济学界的公开药方就是“华盛顿共识”,然而俄罗斯实验的绩效平平,甚至被某些学者视为失败,直接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经过几代领导人的不断努力却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在俄罗斯与中国的现实对比面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或许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界的一种声音,^[1]在他的批判性声音下,很多学者主张用“北京共识”代替“华盛顿共识”。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不少受业于西方的华人经济学家

收稿日期:2010-03-15

作者简介:庞晓波(1955-),男,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也直言,中国的发展奇迹呼唤建立一套本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2]

那么,东亚奇迹特别是中国奇迹的背后到底蕴含了怎样的发展逻辑?笔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考究必须置于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基于体制转轨这个角度,最根本也是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市场与政府的边界问题,而这正是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在经济治理的语境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就是在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内建立起以市场信号治理机制为主的经济治理模式。俄罗斯经济转轨与中国经济转轨最大的分野在于对市场信号治理机制与政府指令治理机制的动态边界处理,这种动态边界体现在两方面,即时间维度的速度与空间维度的均衡。^[3]俄罗斯转轨过程之所以被称为休克疗法,是因为他割裂了转轨的时间与空间联系,在经济治理选择上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策略,从而脱离了经济现实建立起一套完全以市场信号治理模式为主的经济治理体系。相反,中国的经济改革则是充分考虑改革初始条件、改革过程、渐进地实现从完全政府指令治理转向市场信号治理。当然,其中更为重要的一点,中国的经济治理机制转变不是对政府指令治理模式的彻底否定,而是根据现实情况寻求二者均衡,这种均衡不是垂直的替代均衡,而是平行的互补均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对经济治理理论最重要的启示,也是经济治理理论最有可能存在的理论突破口。

其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国家在经济治理上的失败,这将西方经济学界直接推向了风口浪尖,经济学家的声望也随之一跌千丈。很多西方学者都将本次金融危机的源头归结为西方国家货币监管的失当,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旗帜下的货币政策、金融自由化政策最终酿成了危机的苦果。^[4]因此,国际金融危机迫使人们去反思:哪些领域该放开?哪些领域该受到监管?应受到怎样的监管?同样,在经济治理的语境下,前两个问题回答市场信号治理与政府指令治理之间的边界问题,后一个问题则意在探究政府指令治理的有效方式。我们注意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一些学者指出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型治理是重要的危机成因,^[5]然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却让我们看到,规则型治理同样无法让西方躲避金融危机,另外,亚洲的关系型治理也没有引致危机东移。笔者认

为,之所有存在这种现实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宏观治理模式选择上的失误,即上文提到的,我们不应该用替代的观点去审视市场信号治理与政府指令治理,相反,我们应该用互补的眼光去寻求两者的有效水平边界。而这种理论洞见源于中国发展的现实。我们注意到,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都采取了一系列国进民退的救市措施,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甚至出台了一些国有化政策,这正是经济治理模式的一种微妙转变。然而,笔者认为,如果单纯地从垂直边界上寻求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那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只有在水平边界上建立起两者的动态有效边界,正如中国所努力实现的,才是长久之策。

总的来说,东亚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西方经济学界思想转向的外部推动力,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则是这种转向的加速器。当然,西方经济学界转向的结果只是一种妥协性的或者说是过渡性的,因为这种转向仅仅传达了这么一种意识:政府在经济治理中是重要的;而从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现实来看,到底应该建立怎样的经济治理模式,政府应该如何发挥其经济治理作用,目前为止,现实仍然比理论走的更远。

二、中国未来发展需要怎样的经济治理模式

对中国学者来说,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治理问题责无旁贷。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研究:其一是从经济治理的角度对中国与东亚发展历史进行理论总结,理论总结不仅能够为未来研究构建平台,也可以为后发展国家提供理论参考。其二就是立足于当前,对未来的经济治理模式进行讨论和研究,这正是理论研究的核心价值所在。笔者认为,历史经验中需要总结的东西很多,但最为关键的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指令治理与市场信号治理的平行边界与动态均衡。在该观点的基础上,下面重点论述如何建立适应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经济治理体系。

市场信号治理与政府指令治理的动态平行均衡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保证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和谐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但是,政府与市场的这种平行边界是动态的,在未来经济发展中,该如何确定两者的边界将是学术界研究的关键。笔者认为,边界确定的唯一标准是治理的组合效率,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经济领域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机制组合效率,二是经济领

域与其他社会领域治理的部门组合效率。对于机制组合效率,中国应坚持的基本方向是,在最优机制组合效率达到之前,继续根据现实情况有意识地扩大市场信号治理机制的作用范围;同时,在个别经济领域做到收放兼备。这样做的理论依据在于,我们需要坚持推进和深化改革,但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有效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对于部门组合效率,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在大部分经济领域我国已经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治理机制改革,但也还存在很多改革和治理盲点,如医疗服务体系、社会保险体系等,为了保障经济的和谐科学发展,我们必须在其他非经济领域建立一套具有高效率的治理体系。原则上,这些领域的治理机制设计与经济领域是一致的,但每个领域都有自身的部门特殊性。以养老保险改革为例,根据人类生命周期的特征,即个体在幼年与退休后只消费不生产,只在中青年阶段同时进行生产与消费,这种行为模式客观上决定了养老问题的社会依附性。在现代经济中,虽然养老保险基金等中介组织将劳动力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然而对于市场中介组织的信任担忧却始终始终是养老问题的核心考量,从而也导致了形形色色的协调与市场失灵。政府治理则可以消除上述问题,如用政府信用替代市场中介信用,公立养老机构或者养老机构的政府担保制度是上述治理机制转变的主要表现。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只有同时解决好非经济领域的治理问题,特别是那些涉及民生问题的治理问题,才能在全局范围内保证经济的和谐快速发展。

中国经济需要关注的另外一个更加微观的经济治理问题是,政府该如何发挥其经济治理作用,即政府指令治理的有效方式设计。总的来说,可供政府选择的治理方式有两种:规则与相机抉择。前者往往以法律法规等制度形态出现;后者则显得更为艺术,即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即时选择不同的经济治理工具。这两种治理方式设计具有各自的优缺点,首先规则治理具有时间一致性,即在经济动态情境下,规则治理有利于经济个体形成稳定和一致的预期,在制度层面建立经济行为规范。^[6]但规则治理的效率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

规则必须得到严格遵守,即规则需要有完全的执行力;二是规则制定必须科学,能够体现经济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以法律为例,对于前者,意味着各类规范经济行为的法律法规一旦制定,必须得到严格执行,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也即法律的信誉;对于后者,则主要取决于立法者对经济理论的认知与掌握、立法程序与过程的科学性等一系列要素。与规则治理相反,相机抉择虽然能够最大限度的给予政府治理经济的灵活性,但它也将导致个体行为的动态非一致性,因为经济个体无法从政府的相机抉择治理方式中识别并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导致不同个体以及同一个体不同时间点上的行为不一致。因此,两种治理方式的选择本质上是灵活性和动态一致性的抉择。笔者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来说,规则治理是一个目标选择,其理由在于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极大提高了相机抉择治理的成本,而治理机构的知识边界与经济系统复杂性增强也将大大降低相机抉择治理的效率。这也是为何很多学者一直强调制度建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核心理由。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规则治理与相机抉择治理进行对立,一个更为合理的策略是对治理领域进行区别对待,在不同的经济领域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

参考文献:

- [1] 斯蒂格利茨. 全球化及其不满[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2-6.
- [2]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7,56.
- [3] 庞晓波,黄卫挺. 中国渐进式改革辨析:速度与均衡[A]. 王胜今,吴振武. 回顾与展望:吉林大学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C].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295-306.
- [4] 程恩富,王佳菲. “猛虎”是怎样放出笼的——论金融自由化与美国金融危机[J]. 红旗文稿,2009,(1).
- [5] LI J. S. Relation - based versus Rule - based Governance: an Explanation of the East Asian Miracle and Asian Crisi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3,11,(4).
- [6] KYDLAND E. F. ,PRESCOTT E. C.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7,85(3).

(责任编辑:晓 轩)